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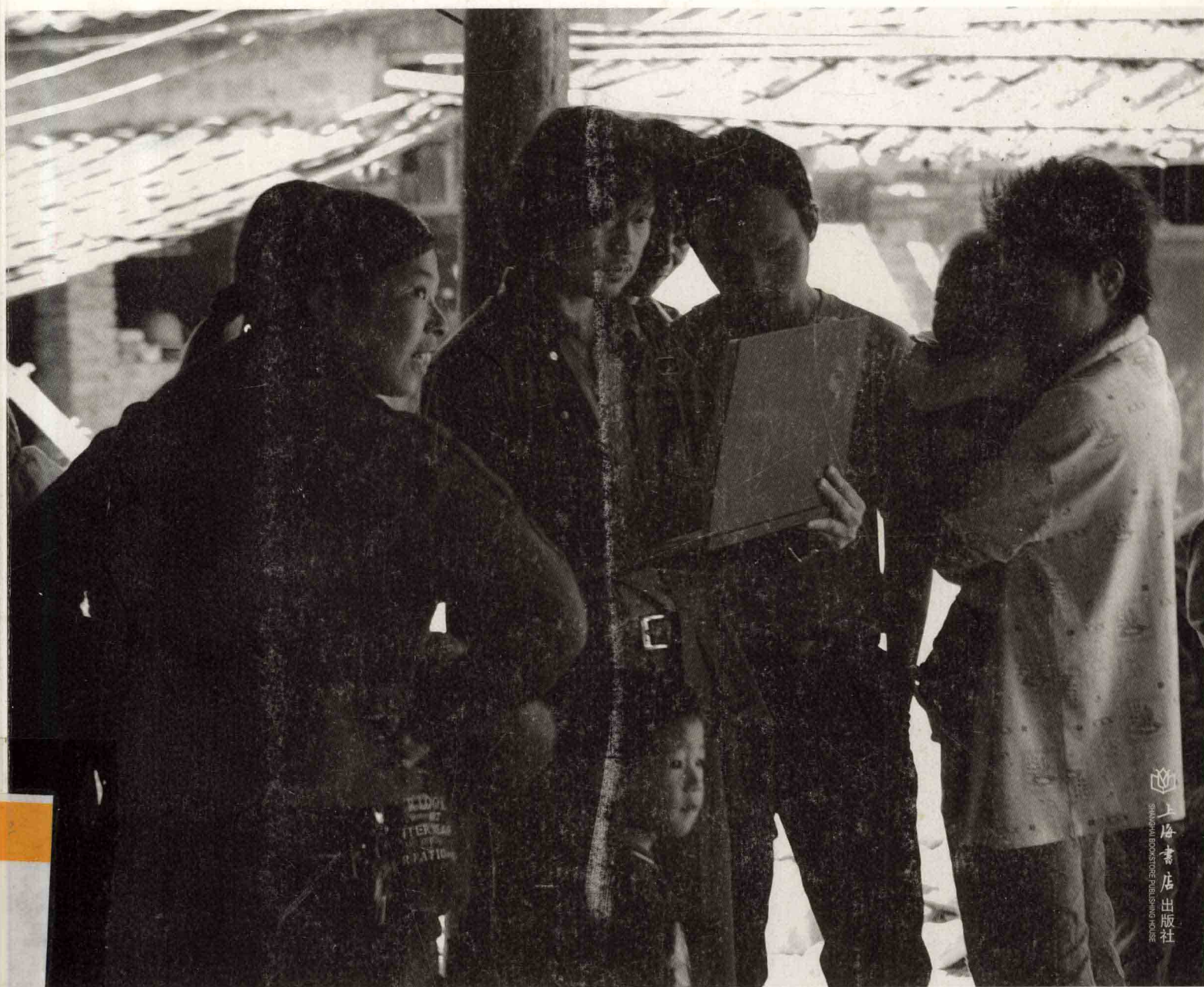
陈铎

武夷二色

武夷山是绿色的——它的山峦和溪水。武夷山是红色的——它的丹霞和赤壁，还有风展红旗如画的壮举。拉开历史的帷幕，千载儒释、道金黄色的文化光环笼罩着武夷山水……那些比乡村老屋建筑、陈旧物件更重要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更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

人文武夷

龚云表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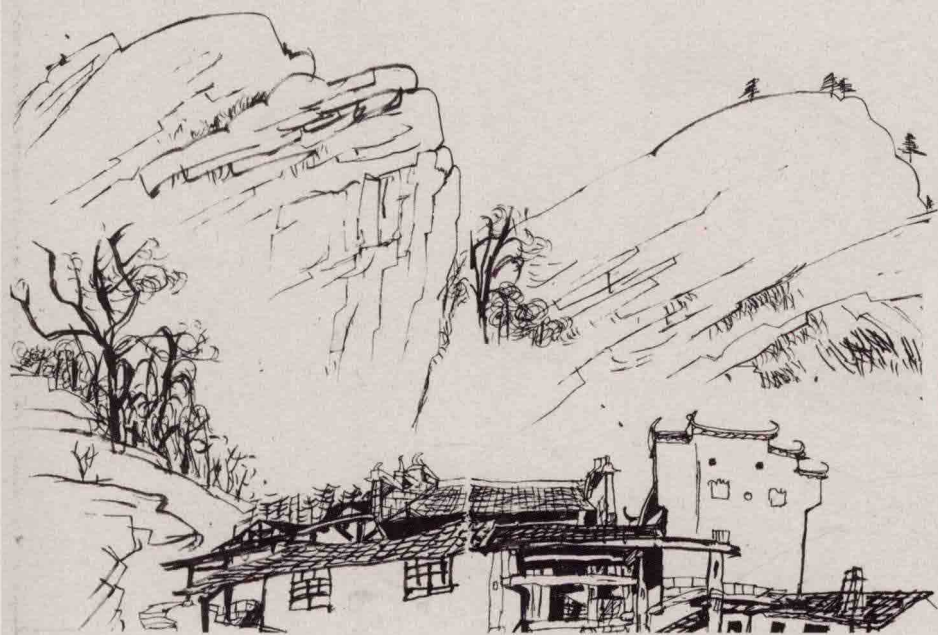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陈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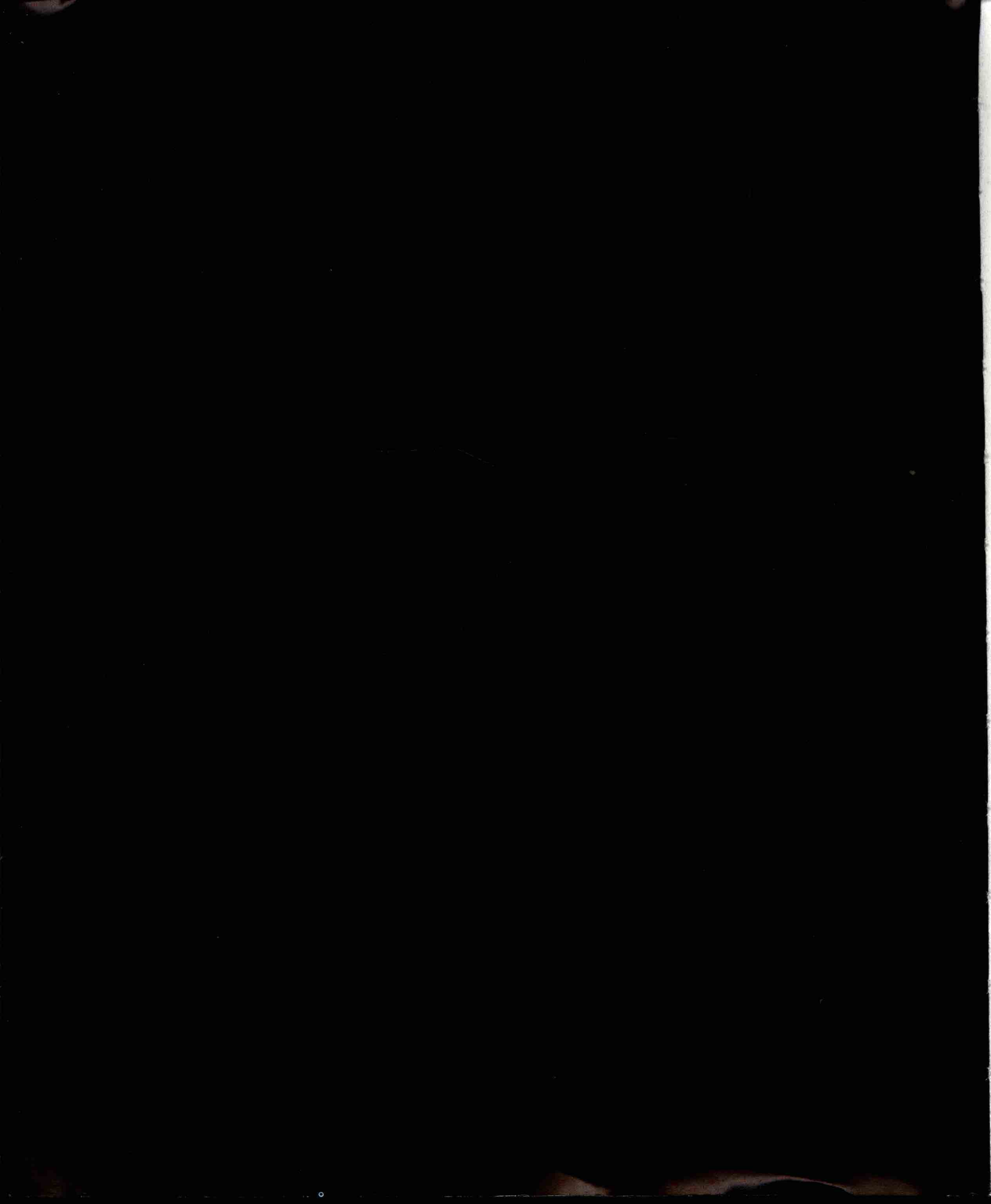
武夷三色

龚云表 主编

人文武夷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6 总序 (郑春)

8 前言 (叶廷芳)

12 绿——星村

- 14 一 村落
- 22 二 码头
- 26 三 九曲花街
- 28 四 水渠、井台
- 32 五 街头
- 36 六 剃头店
- 40 七 天上宫与林清道长
- 44 八 刘焕章
- 48 九 陈佳
- 54 十 张仁川
- 58 十一 老伙计

62 红——大安

- 68 一 四渡桥
- 72 二 革命“五老”
 - (一) 高富文
 - (二) 张连娣
 - (三) 暨财生
 - (四) 邱美娥

- 84 三 小柯
- 88 四 雪后
- 94 五 冬天的田野
- 102 六 大安源
- 106 七 红色导游
- 108 八 坑口
- 114 九 厅级村支书
- 118 十 红军茶

122 黄——吴屯

- 126 一 一访瑞岩寺
- 130 二 再访瑞岩寺
- 136 三 三访瑞岩寺
- 144 四 水牛
- 150 五 稻花鱼干
- 154 六 蜡烛会
- 158 七 乡干部
- 166 八 三角壶与喝茶俗
- 170 九 土狗

176 后记





总序

郑春

人文，使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历史绵延、文化积累的印迹，形成独特的精神文化。艺术作为人文精神的载体，焕发出独有的智慧光芒。武夷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历史悠久，人文遗存丰富，延续传承这些渐逝渐远的精神家园，是义务责任，更是一种情怀。

在近代民族文化变迁中，我们时常丢失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人文情怀。失去文化领地的土壤上，除了对原生性物种的破坏，就是长出了变异的、侵略性的物种。今天，文化的复兴和繁荣，更要以人文传统的回归作为标志，在武夷山组织“人文武夷”中国古村落艺术调查活动，试图尝试寻找回归的途径和脉络，或许能有所收获。

武夷山是福建古村落发育较早的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的活动、迁移，从干栏式到砖、木、石雕构建的精美建筑。及至明清时期，村落营造已有了较好的规划，加上人文元素的注入，并受理学、风水术数的影响，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倾向、价值，反映出移民耕作方式，田园山水意境，退世隐居情结和自然诗画气

氛。这些村落还保留着原住民，保存富有地域特征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一个个文化生态博物馆，虽然时代变迁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许多，有些房屋不同程度损毁。这也正是我们从组织“印象武夷”风景写生、“意象武夷”中德艺术家交流互动到“人文武夷”艺术调查的缘故吧。

“一群好兄弟，品茶做诗篇。风景灌眼眸，真情驻心田……”莫言先生题赠的诗句，正迎合了大家的心境，共同的人文情怀。几位艺术家，从“印象武夷”、“意象武夷”，水到渠成地走到“人文武夷”，两年时间也是我们举办艺术活动历时最长的一次。参与的艺术家人一次次离开繁华的都市，一次次舍弃喧嚣的商业活动，驻扎到村里，成为乡村一道夺目风景。殷雄对城村的人文历史如数家珍，被称为“荣誉村长”；王辉住村时间最长，成为村里老少爷们都熟悉的“王老师”；九杰住到了自然保护区桐木村里最边远的麻栗自然村，夜间也“被迫”写生，于是有了一个“星光”系列；陈铎填补了山北村创作的空白，他的调查涉及三个乡六个村，每到周末他的妻子便成了“随行记者”；梦光、晓燕、王

琨把在上大学的女儿也调动参与其中，协助艺术调查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平添了一份亲情的温暖、和谐家庭的图景。在整个活动中，参与的艺术家用深入到历史、现实的事件、人物中，将心灵的历程形象化，融入到每篇文章，每一个笔触、线条和画面的结构、色彩里，以古村落生动的人和公共空间为“境象”，从传说故事、民间民俗和廊桥牌坊、古宅老院等建筑中感悟古韵流风，提炼精致缤纷的武夷人文优秀基因和珍贵历史遗产。

艺术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其价值不容置疑。在当代艺术越来越成为精英阶层的奢侈品的今天，更要培养根植大众的艺术主流。主流艺术不应拘于艺术家、画廊和美术馆、艺术刊物之间，深陷于被神化了的艺术体制、泡沫化的市场机制。艺术作为思想和情感的通路，现实生活的空间和人文现象才是真正意义的美术馆、博物馆，社会公众在与艺术家融合交流中，才能参与到自己生活的审美体验中。在“人文武夷”活动进行的过程中，从活动定位、题材选择、创作研讨都始终给予了这方面的关注和思考。2005年末“意象武夷”中德艺术家交

流互动的作品在城村首展，以村民为主体的观众，他们观看展览的方式和评价，给每一位中德艺术家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这里参与、融入更胜于理解、诠释。看到村头巷尾创作的艺术家用与村民在一起的画面，本身就是一幅极其生动的文化生态图。在我接触新闻工作二十余年中，每当看到艺术家们带着采访本、录音笔走村入户调查采访时，总有一种感动涌动，也让我有更多的期待。

“人文武夷”丛书的出版，愿能为远离大众生活空间的艺术提供思考、启发，唤起人们对人文传统回归的向往和对古村落的保护，给大众以美的滋养和观念的改变，谢谢朋友们！

成书之际，龚云表老师执意留白于我，作为始作俑者，权当“作茧自缚”吧。

2008年10月3日于武夷山

前言

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拯救

叶廷芳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为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欢呼，为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刺激而陶醉。君不见，20世纪上半叶的文坛上，中国最杰出的诗人郭沫若，看见“摩托车前的明灯”，发出“20世纪的阿波罗”的赞颂；欧洲的伟大戏剧家布莱希特，面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欣然赞叹：

“科学正在打开新的黑暗领域”。这两位东西方文坛的现代智者对于文明进步的线性思维，反映了人类大多数对这一问题的乐观态度。人类因越来越陶醉于文明必然不断进步的假象，而对大自然任意索取。尽管有极个别入已经察觉到人类文明正以“异化”的方式发生背反，如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已经预见到对大自然的有增无已的掠夺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如德国小说家德布林。但那只是空谷足音！人类获取一个重要的真理，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敲醒了人类的理智，使人们变得更清醒、更宽容些了！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堪称这一猛醒的征兆。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思潮是一种“反思”思潮。在人文领域，它反思过去，回归自然，呼唤人性，呼唤宽容，呼唤传统，呼唤“天人合一”，从而促使人的自我意识的“再觉醒”。欧洲的文艺复兴，使人在神的面前站了起来，但接着又在另一个“神”，即自然之神的面前倒了下去。殊不知，自然之神才是宇宙间真正的神，这是得罪不得的，得罪了就要

受到惩罚。人类自从拥有了大规模改造自然的有效武器——先进科学技术，就日甚一日地对大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和蹂躏，很快把自然之神激怒。于是臭氧空洞示警、厄尔尼诺逞威、冰山动容、沙尘肆虐等报复性措施犹如一张张“黄牌”朝人类劈面而来。现在，受到惩罚的人类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终于看到自己的“非人”本质，试图重新站立起来，调整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新做人”。

这种“重新做人”的决心，我把它视为生态意识和文物意识的觉醒，是人类对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那句“认识你自己”警语的开始履行。这一觉醒的先兆首先出现在那些经济文化率先发达的国家，主要在欧美。原来这些国家奴役自然的时间最早，历程最长，因而最先吃了被自然报复的苦头。于是二战以后，这些国家急切地呼吁：人类应当赶紧行动起来，共同签约，共同拯救和保护生态环境。于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先后签订了《罗马宣言》、《威尼斯宪章》、《巴黎公约》等诸多的国际协定。尤其是1972年的《巴黎公约》，开了申报“人类遗产”或“世界遗产”的先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德国的“绿色和平组织”诞生了！这又是一个重要信号。它标志着保护环境已经从“意识”发展为“运动”。接着德国绿党的建立，更是使环境保护从文化行为上升到政治层面。尔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

盟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口号，这导致了不久以后世界政府首脑保护环境大会的召开。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人类应对环境恶化威胁的行动已迫在眉睫，这进一步迫使人们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比起国外至少晚了三十年！当《巴黎公约》诞生的时候，我们的推土机正在北京城墙上轰鸣！直到1985年我们才加入《巴黎公约》，1987年才开始申报“世界遗产”。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不少政府官员还不愿意将减排减污等环保措施提上议事日程。至于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建设”的破坏至今也没有停止。但正是从那时起，改善环境的意识毕竟已经开始觉醒了，首先在文化知识界，著名学者梁从诫先生自筹资金，办起了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在建筑文化界，针对大量乡土建筑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经济建设迅速被毁或消失，多年从事西方建筑研究的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不得不来了个“急转身”，勇猛地投入到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的行动之中；以古稀之年带领学生一次又一次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呼吁、争辩，十余年如一日，保护了几十个名村名镇。虽然在2000年前，很少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著作。但曾几何时，跨过新世纪的门槛不久，出版社也很快开始出版他的抢救成果。上海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对周庄的发现和成功保护，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文物意识的迅速觉醒。自此，“中国古村落”丛书、“乡

土中国”丛书、“老房子”丛书……争相问世。

艺术批评家兼艺术策展人龚云表先生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文物意识较早觉醒的一个。他策划的这套“人文武夷”丛书，在笔者看来就是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一种努力，也可以说试图让人类“重新做人”的一种尝试。作为主编，龚先生把“重新做人”的“炼狱”之地选择在武夷山，这是很有眼力的。武夷山对于觉醒的现代人来说不啻是一方“净土”或“圣地”。她位于闽北，在方圆60公里的地域内，群峰竞拔，山峦逶迤，溪流瑰丽，飞瀑高悬，亦是造化所钟之“神秀”，难怪成了曾经雄霸一方的古越国的都城所在地，亦是中国巨儒朱熹最钟情的家园。两千多年来，这里积累了农耕时代留下的极为丰富的文明遗产，储存着深厚的人文蕴藏。那众多的依然保持着原生状貌的古村落，便是它们的载体。这些侥幸地躲过了现代文明衰渎的古朴村落，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简直就像颗颗明珠散落在千山万壑之中。我们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些我国农耕文明的遗存，主要是因为迟到的工业文明以摧枯拉朽之势莅临我国的时候，它们没有像大多数地方的古村落那样，成片成地被摧毁，被横扫，继而变成一堆堆冷漠、僵硬、失去了任何历史记忆的“水泥森林”，而依然保持着农耕时代的鲜活的本色，成了农耕文明的“活标本”或“活化石”，成了历史的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因为它们包

含着丰富的故事，这些故事就像“香袋”那样时刻透露着生动的历史文化信息，让人们保持着亲切的生命记忆，并获得一种温馨的精神家园感。

我们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古村落，还因为我国农耕文明的物质遗存和文化遗产主要是在农村。可以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主要体现为农耕文明。因为在自给自足的封建时代，土地是维持一个民族生存的主要资源。农村也是“机器前”时代“工业”生产——手工业作坊的主要基地。封建时代的政治势力主要也在农村：除了地主，即便那些远在省里、朝里做官的人，也几乎没有一个不在他的家乡营建豪宅和墓茔——他的身份和权势的象征。无怪乎，全国最大的民宅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即如浙江东阳的卢宅，其建筑面积几近五分之一的故宫。其他如乔家大院、祁家大院等等那样的豪宅在城市里也是罕见的。甚至那时有不少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大学问家，包括上文提及的大思想家朱熹，都是在乡村度过他们的黄金岁月的。今天只要我们看到这些完整的古村落，看到那些构成乡土文化基本风貌的铁铺、水碓、磨坊、织坊、牌坊、祠堂、寺庙、私塾、书院以及众多的“大宅子”……就基本上看到了当年的大社会，看到了大半部历史。须知即使当年的市井文化、庙堂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也是以乡土文化为基础的，而且二者互为呼应。因此笔者赞同潜心研究和抢救乡土建筑多年的陈志华教授的这一看法：“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目前全国有不少名村、名镇被旅游部门炒得火热，也有一些有关专家从抢救古建筑出发奔赴那里付出了辛劳。但“人文武夷”中涉及的这些古村落似乎没有这个宠

幸——虽然自1999年起武夷山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自然与文化双重世界遗产了！所幸“人文武夷”的主创者或主编者偏偏没有顺着一股风地追逐那些名村名镇去赶热闹，而把关注的视线投向这些有关专家们一时未能顾及的古村落；不是对它们的“硬件”进行技术性的抢救，而是从“软件”切入，探索和发掘其中蕴藏的人文价值；需要的不是专家的知识 and 作家的文笔，而是艺术家的眼光和感知的情怀；不是用相机去复制对象，而是用画笔去解读它们；使用文字不是为了客观描写，而是观感和思考的记录。于是成就了这一套图文并茂且别具特色的多卷本丛书。无疑，这是一项别具创意的文化行为，也可以说是一项更深层次的文物保护、发掘和抢救工程。

恐怕很难找出比龚云表先生更合适的人选来从事这一工作了！他既富艺术感觉，又具学术识见，更有人文关怀和开放视野，他对精神家园的丧失有着切肤之痛。他并不想一蹴而就地完成这一工作，而是把它当作一件心爱的作品，经过精心的构思和策划，准备用几年时间、多次活动、多种形式来迎接这一将艺术与文学合而为一的、富有创意的精神产儿的“临盆”。首先，他参加了在武夷山举办的一个绘画写生活动，有几十位画家参与。在那里，他与画家们对武夷山人文内蕴的体认、主张一拍即合，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印象武夷”、“意象武夷”、“人文武夷”的“三部曲”的构想由此获得了雏形。他被大家推举为总策划人，并委以主编的重任。为此，他在武夷山进行实地考察，一口气走了十几个村镇，从中初选出较典型的一部分，作为尔后的活动据点。一年以后，即2005年，他不负众望，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更为有声有色的活动：“意象武

夷”。从“印象”到“意象”，这是一次升华。四十余位中国艺术家和十来位德国艺术家在武夷山进行了十二天的“联谊创作”活动，最后每人拿出数幅作品分别在武夷山和古村落城村进行展览，吸引了众多的男女老少的村民参与，别开生面。实质上这是一次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精神家园的精神动员。它让这一大群的村镇主人和人文蕴藏的天然监护者如梦初醒：我们正想逃离的这些与城里的高楼大厦相比不足挂齿的房舍街巷，竟也受到城里人和读书人如此看重，则我们自己当更加爱护之、珍惜之。笔者也有幸应邀经历了这一活动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两国艺术家怎样通过不同的创作理念和共同的人文思维将沉睡了千百年的古老村落的生机激活，使其重新焕发出人文蕴藏的现代光辉，也为两国艺术家的长远合作创立了一种可资参照的模式。

活动又有节奏地向前跨了两年，即2007年，在有了上述两项活动的积累或“历练”以后，龚云表先生的计划便推进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项活动的实施，得到了武夷山市委宣传部郑春部长的鼎力相助，这是活动得以圆满完成的可靠保证。经过多年观察，龚先生从颇有实力的几十位少壮派画家中遴选出七位（加上自己共八位），即殷雄、王琨、王辉、赵九杰、岂梦光、徐晓燕、陈铎。画家们各选一个村子作为工作对象，调查内容包括：村史、村景、生态、建筑、民俗、宗教、农事、家史等。但根据各村不同的情况，每个村子的关注点各有侧重。这样，这些古村落呈现在画家们笔下的面貌既有闽北地区普遍存在的共性，比如古朴的原生状态；又有每个村子独特的个性，比如有的自然生态浓郁（如桐木村），有的人文蕴藏深厚（如五夫村），有的历史进程久远（如城村），有的民俗风情奇特（如曹墩

村）……于是，这套丛书就具有了统一色调下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因而与其他以文字和摄影构成的类似丛书区别开来，拥有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品格。

一般说来，艺术家多是“性情中人”，率真，甚至“童真”、洒脱是他们的基本精神风貌。这与武夷山村落的古朴、纯真，自然可以说正好相谐相扣，互为辉映。其中三位在闽北地区长大的画家的文字尤为可亲。特别是殷雄，他像一位精神流浪儿，带着被现代文明的“妖女”诱惑后而自新的悔恨，诉说他当年如何怀着切齿痛恨离开了故乡，如今幡然悔悟回来重新认“爹”认“娘”的心路历程，读来令人怦然心动。因笔者也出生在农村，也曾有过相似的思想经历。陈铎是个地道的“本土”画家，迄今仍坚守在武夷山。他以画家眼中的绿、红、黄三种颜色来描绘家乡的乡风民俗，那些烂熟于心的古村风物，让笔者不时发出会心的一笑。王辉离武夷山稍远一些，但他多次深入乡间作近距离的观察，他深知近距离的观察比远距离的眺望要真切得多。故这样有分量、有哲学意味的话出之于他之口就不足为怪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沉重，绝不可能使一个地处偏远的古村，落得一身轻松。”其他几位作者的视角和笔触各有不同，因而呈现不同的景观，但古村情结的饱满情怀则始终如一。这里不妨套用一句古语来概括这套丛书的风格和价值：“和而不同。”

2008年10月17日

绿——星村

星村，是一个被绿色世界包裹着的村落，放眼望去皆是翠绿的山、碧绿的水。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庄山中有茶，水上有筏，这两大著名的产业印证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一俗语。这个古老的村落和它山水的颜色一样，连流淌的故事中也有着绿色的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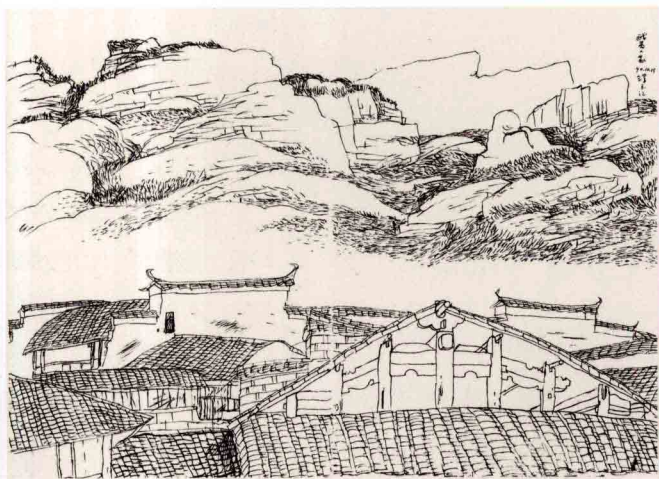
“我乘星村舫，辍棹青草央”是朱熹《行视武夷精舍》中的一首诗。传说九曲是地上的九天银河，九曲溪的第九曲就是星村。“星村”即是“星聚”，“聚，谓村落也”。星村依河而居，门前的这条溪流自古就是一条繁忙的水道，繁荣之时码头货船多达一百多艘。作为古代武夷岩茶的集散地，小小的星村就有三十六个茶行，各地茶青汇集此地加工，茶香四溢，商贾云集，难怪历史上有“茶不到星村不香”之说。通过对一些老人的访问，得知过去村里的江西、广州、汀州、抚州四大会馆竞相争辉，街头巷尾的古戏台轮番唱戏，热闹犹如江

南，星村也就有了“小杭州”之称。今天星村码头仍然繁忙，只不过船载的不是货物而是乘筏游玩的人们；当时九曲也不是今天可以见底的浅滩，而是可以舟船来往的溪流。桐木的正山小种红茶，星村四周的乌龙茶从这里水运经赤石，过建阳、延平抵福州，出海到世界各地。

我有一本页面已发黄的速写本，是十八年前在星村所画。1990年我带学生下乡，在当时还是“崇安县”的星村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和学生一起画画，记录了星村当年的很多场景。近二十年过去，星村已今非昔比，我曾数次寻找速写本中所描绘的地方，但多是徒劳。我庆幸这些图像的存在，十多年前不经意的随手勾画，成了见证这个古村落变化的珍贵图像。



一 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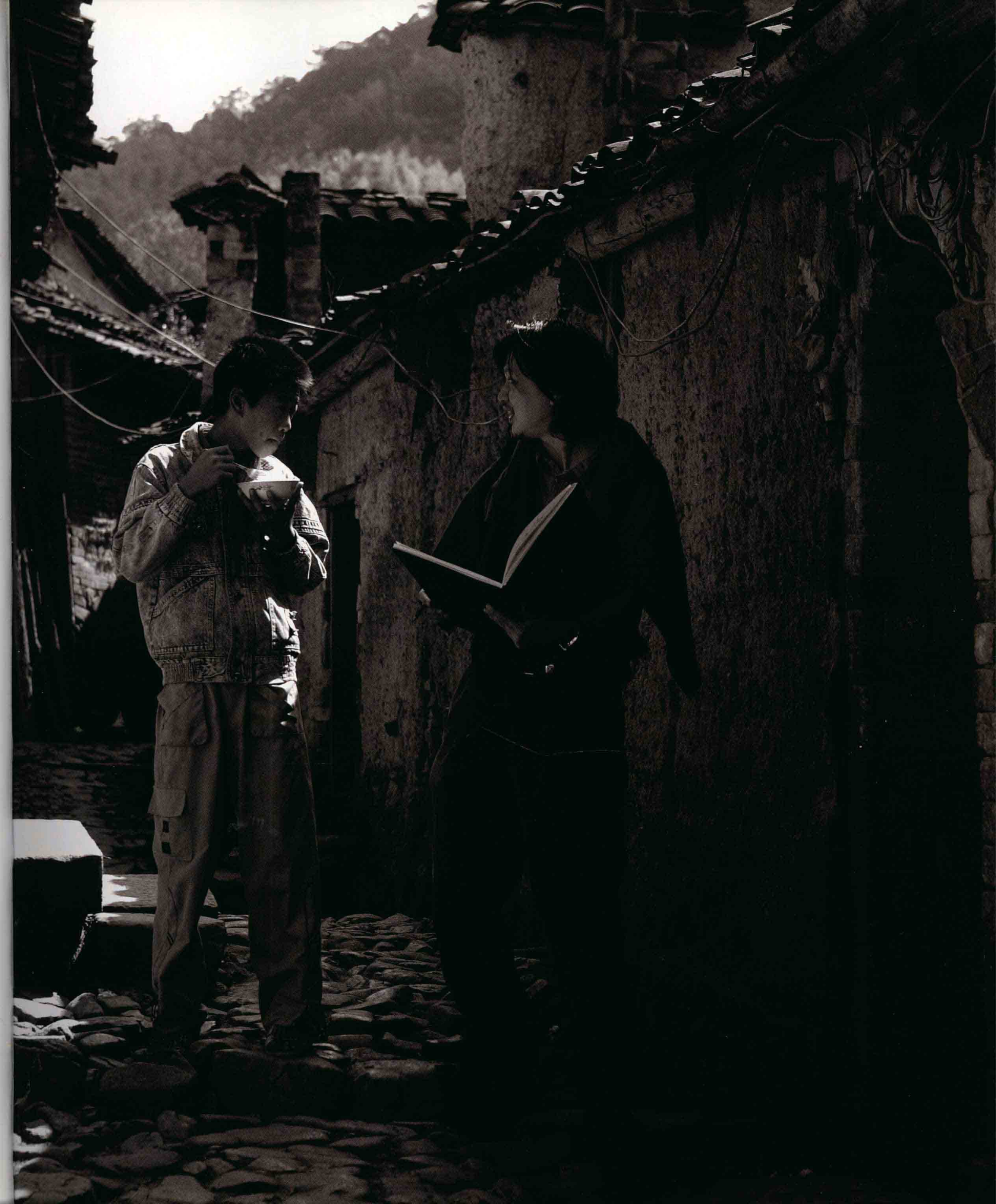


村落之一 钢笔

村落，是相对于城镇而言。星村与其他星罗棋布的村子一样，村落场景中公共空间的聚散、兴衰和流变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和有趣的因素。

地处山区的星村因为门前的九曲溪流，很早就显示出码头文化的一些特征。溪水冲刷了这个山区村庄传统小农社会的结构，冲淡了以宗族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色彩，它与闽北山区其他村落以封闭性为聚落特征有所不同。由于外地客商云集，人口成份复杂，宗族色彩相对淡薄，村落中最显赫的建筑并不是闽北最常见的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宗族祠堂，而是以全国各区域命名的会馆。江西、广州、抚州、汀州四大会馆的风光远远盖过以本地家族姓氏命名的祠堂。会馆门面雕龙画凤，竞相争艳；内部空间宽敞，功能齐全，不仅提供食宿，内部还设有交际、娱乐和宗教的会堂、戏楼和神庙。会馆聚集了来自各码头的外乡商人，超出了家族和血缘的圈子，在更宽阔的区域内聚集起“江湖”的力量。

根据1964年的人口调查显示，星村村人口来自18个省64个县，真可谓“五湖四海”。在开放、流动的村落空





村落组画三幅 钢笔

间中，外地商人不断渗入，码头势力不断壮大，茶叶的贸易促进了本地商业、娱乐业、手工艺、运输业等各行各业的发展。在这种人与人、人与物的往来与交易中吸纳并综合了各地的乡音、习俗和文化，商业码头的流动性冲击并改变了这个深藏于武夷山中的村落。

如今星村街巷仍有残存的旧格局，遗留下的旧名中还可看到当年商肆的布局。位于街头的“盐仓巷”，是当年星村盐业储存和交易中心。船来船往、货去货回，当地的茶叶、笋干等农产品运往福州，归船上满是满仓的盐巴、虾米等海产品和日用品。“马道”是现在九曲花街后面的一条小路，顾名思义这里是当年驮货马匹上下码头的通道。“马道”四周住的都是干苦力活的下层人，不是船夫就是马夫和搬工。“马道”路在“文革”时被改名为“跃进”，但当地人总还是习惯用旧名称呼。街巷地名往往要比它的建筑更有生命力，当实物消亡，它